

十个故事,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听西法大十位离休老党员讲述红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为了推进学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性和多元性,我们走访学校离休老党员,听他们深情讲述和中国共产党血肉相连的

故事。这些故事诚挚感人,体现出老党员们无私的情怀和不忘初心的执著。让我们走进峥嵘岁月,听过去的故事……(依照被访者入党时间排序)

听党话,跟党走



王翠芬,河北定县人,1929年7月出生,1944年12月参加革命,1942年6月入党,1985年9月离休。

王翠芬出生于1929年,成长在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她1942年6月入党,1944年12月参加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

忆及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王翠芬的眼眶充满泪水。“最难忘在工厂里工作的日子。”王翠芬回忆那段峥嵘岁月,“当时晋察冀军队在村里招工,我就与同村的几位女孩一起去参加工作。工厂在山区里,通向工厂的路上有一段日本人控制的铁轨,铁轨两边都挖了深沟,日本人在此放哨巡逻,白天根本无法通过,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我们才能偷偷地爬深沟过铁轨。”年少时候的王翠芬还不能真正明白自己选择道路的意义,但是出于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理想,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

来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兵工厂后,王翠芬所在工作组负责熬硝,熬出来的硝可以装在地雷、手榴弹中制成炸药,她主要负责取药、配药和保管药环节的工作。保管室到工作室有一段距离,在一次取药过程中,药品因摩擦而爆炸,她也因为火药爆炸造成面部损伤,在医院住了近20天。

革命精神拥有无穷的感召力,王翠芬出院后依旧坚持在工厂工作。“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粮食短缺,无数革命先烈倒在了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无数无辜百姓在战争中死去。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党领导的绝对胜利,更是四万万人民群众齐头并进积蓄的能量。”王翠芬哽咽道。志向坚定,奋斗不息,是王翠芬青春岁月的鲜明写照,她用自强和热血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跟着党走,听从党的指挥,坚守党的使命,这终将是我一辈子坚守的信仰。”王翠芬如是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马朱炎,陕西蒲城人,1926年11月出生,1949年2月参加革命,1950年1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1926年,马朱炎出生于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大家走了三天,冲出封锁线,来到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所在地。我和其他青年一样,怀揣着一颗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心,迈进了学校大门。”马朱炎心怀革命信念,风雨如晦,初心不改。“我是由地下党西北大学林平乡党介绍到延安大学韩城分校学习的,1949年2月1日正式报到,被编到当时的13班,我是班长。”也就是在这一天,马朱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战火纷飞是当时环境的代名词,生活艰苦是那个年代的出品物,众多革命志士将“战争的成败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解放的命运与自己的出路连在一起”作为信条,马朱炎也不例外。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是马朱炎革命的第一站,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那里他度过了富有激情的青年时代。学校当时没有教室,餐饭只有清水煮萝卜,但是他依然满怀希望,刻苦学习,与同学一起参加劳动建设,改善学习环境。

“学校有形势教育课,我们每天要看报纸,看上面所做的形势报告,当时看到了沈战役胜利、淮海战役进行、山西太原解放的消息,全校学生激动的敲锣打鼓到农村去宣传,边走边喊:‘山西解放了,太原解放了!’我们的心情是你们无法想象的。”马朱炎谈到,在延安大学学习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到西安

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再到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西法大自烽火岁月里艰难诞生,又在和平年代里曲折成长。学校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马朱炎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时至今日,他依旧清晰记得自己是在1950年1月15日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领我们过上美好生活!”

坚守、弘扬、传承“延安精神”



赵建学,陕西宜君人,1932年9月出生,1949年2月4日参加革命,1950年2月入党,1993年9月离休。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切问候中央政法干校第8期学员时的合影。”赵建学拿出在家中珍藏数十年、保存完好的照片,仔细地介绍合影中的人物。指着合影中的自己,他感慨,“我这样一个出生在偏远山区的穷孩子,就是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才有机会走出大山,党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关怀。”随着记忆的长卷徐徐展开,赵建学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光辉岁月。

“1949年2月,我还是一个16岁的毛孩子,从老家宜君徒步400华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家中大哥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也是受到他的影响。”赵建学1932年出生于陕西省宜君县,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到达延安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处工作,1949年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西北局的领导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芳,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与这些大领导打交道。1949年底,贺龙调往西南,临行前在西安易俗社开欢送大会,习仲勋致欢迎词,贺龙致答谢词。会场气氛相当热烈,我也有幸参加。后来,彭德怀调去领导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马明芳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由习仲勋主持工作。”谈及往事,赵建学眼中散发着光彩。“习仲勋很关心机要工作,时常到我们办公场地探视,非常平易近人,在电文中可以经常看到中央对他成绩的肯定及他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和口碑。”

“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辉煌历史,我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我将一生坚守、弘扬、传承‘延安精神’,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赵建学的言语铿锵有力。

用生活的困难磨练人生的底色



罗楠,陕西渭南人,1929年6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3月入党,1990年4月离休。

“入学考试考一天,上午考语文,就一个题,让写一篇文章‘蒋管区的见闻记’,主要考察学生的立场、观点。下午的考试都是政治问题,主要考政治常识。我记得试题中列了一连串的国家名字,问你哪些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些是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5月,延安大学在陕西渭南招生,时年20岁的罗楠成为延安大学分校的一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者。“我是在延安大学成长起来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7月份学校迁至西安。“我们是7月底来的西安,那会条件艰苦,自己也没钱,冬天的衣服都是统一供给。同学们背一个铺盖卷,手里拎着个布兜,就这样搬了,一天跑个百十里路都不觉得累,来的时候就是行军到大荔。从大荔公路一直到华阴的敷水,从敷水坐火车,然后到西安。坐的都是拉货的敞篷火车。”罗楠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我们都被安排在大厂房学习,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但是同学们仍然激情满满。”

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杜道夫,山西榆社人,1932年5月出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1951年3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响起阵阵枪声,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年多的时间,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大半个中国落入敌手,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日寇侵略愈演愈烈,战火不断升级,常常有炮弹从天而降,村民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地逃往防空洞。在一次浩劫中,村子全部被烧光了,包括在逃难的父老乡亲!”杜俊文出生在山西榆社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里,日寇的肆虐让家乡面目全非,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残暴行径,他毅然决定投身革命。

1946年,杜俊文随回乡探亲的叔叔离开家乡。14岁的少年走了五天五夜,终于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党政机关所在地——河北邯郸,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中央局社会部(后来的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从事警卫工作。“当时条件苦,吃了上顿没下顿,餐桌上找不到菜,战士们吃的是小麦饭、烤洋芋。冬天脱下棉袄,没有一个是不打补丁的。”战略反攻时期,他同驻守在武安的战友们一起,投身于建设生产,“打毛衣、纺棉花,这些我都干过。”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杜俊文跟随党中央的脚步进驻北平,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新政协筹备会警卫处的警卫工作。“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他刚刚从西山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我有幸在这个区域里工作,这个场景永生难忘。”多年后,杜俊文回忆起初见毛主席的时刻仍旧难掩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我的任务是机动,随着警卫处机关在中山公园门口集结待命。那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天!”杜俊文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受阅方阵,参与了万众欢呼的庆典时刻。杜俊文的回忆在这一刻定格,不禁热泪盈眶。

“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干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能和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幸运、幸福、难忘。”1951年3月,杜俊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



杜道夫,贵州岑巩人,1928年10月出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1953年11月入党,1989年12月离休。

“经历过战争,方知和平来之不易。”这是杜道夫最常发出的感叹。1928年10月,杜道夫出生在贵州岑巩,1949年6月入伍参加革命,1953年11月入党。1949年6月至1956年8月,先后在二野五兵团赣东北军政干校、解放军第十步校、解放军昆明步兵校工作,任文书、分队长和排长等职。“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是杜道夫仍旧能够清晰记得,自己入伍时激动的青葱模样。

“1949年4月底至5月初,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了整个赣东北地区,随军而行的赣东北区党委和南下支队立即进行接管,建立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培养人才,增强新生力量,赣

东北区党委创办了赣东北军政干部学校总校,在所属各县举办干部培训班。赣东北革命老区的广大知识青年踊跃报考,学员达8000多人。”杜道夫的回忆缓缓打开,“这些同志原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后,不少人成了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是先进工作者和行业中的模范人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春的西藏,被叛乱的阴云所笼罩,直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战才胜利结束。战争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一切百废待兴。”杜道夫谈起坚守雪域高原的经历,“1960年9月我到达西藏,在那里度过了21年,先后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和民政厅工作。从动荡年代到和平岁月,那些年什么样的苦没有经历过,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一名军人应尽的责任和担当。”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开始,杜道夫便下定决心为党和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从青丝到白发,他对党的信仰从未改变。

和平,来之不易!



刘振江,山东寿光人,1926年10月出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1953年12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刘振江1926年10月出生在山东寿光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不识字,因此将自己对知识的向往寄托在儿子身上。刘父对刘振江的学业格外重视,在父亲的督导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级中学。内战爆发后,学校停办,刘振江在战火的逼迫下辍学。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对时局十分关注,祖国统一是国人心之所向。”1948年,刘振江毅然投身革命,“那时特别希望能够参加革命,能够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称:“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自此,渡江战役打响。刘振江也投身于这场著名的战役,并成为战争胜利的亲历者。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渡江战役结束后,毛主席挥笔写就的诗句。“革命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在这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多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刘振江回忆起这场“天翻地覆”的战役,感慨万千。“学生时代只知道时局不安,但是当自己真正从战场上走过一回,才能从心底里体会到和平来之不易!”

难忘的经历让刘振江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强烈的归属感。1953年12月,他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一生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一生都会感恩于党,我要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解放战场上的文艺兵



赵桂章,河北馆陶人,1934年2月出生,1947年8月参加革命,1954年10月入党,1989年12月离休。

1946年8月的一天,一支部队来到赵桂章的村子里,不到14岁的她“跟着部队就走了”,就这样和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参加了解放军。她回忆说:“因为我家里是贫农,最初参军主要是为了活下去。”生活贫困与阶级压迫让这个小姑娘决然离开家乡,不顾年少体弱坚持跟随部队一起出发,她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被改变。到部队之后,由于年纪太小,赵桂章先被安排学习文化知识。她在部队学会了认字、表演、唱歌、跳舞,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文艺兵。(下转三版)